

关于艺术设计学科发展的思考

文 / 刘纲纪

我历来认为,美学研究既要重视比较抽象的基本原理研究,也要充分重视和各部门艺术相关的应用性美学的研究,使前者能够有效地作用于后者。我过去对书法和绘画中的美学问题作了一些研究,目的就是为此。除书法、绘画之外,我对艺术设计问题也很有兴趣。记得在1980年10月,曾应湖北省工艺美术学会之邀,做了一个题为“谈形式美”的报告,后来收入我的《美学与哲学》一书。这个报告所讲的实际就是我当时对和艺术设计相关的形式美诸要素及其法则的思考。最近读到了武汉纺织大学艺术设计学院欧阳巨波教授主编的《艺术与设计研究》(第一辑),感到这个文集编得很好,所以我想作为一个读者来谈谈我的读后感,同时也再次谈谈目前我对艺术设计的一些想法。

本书的一个十分可贵的特点,就是非常鲜明地将当代中国艺术设计的发展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紧密地结合起来,并由此出发对如何办好艺术与设计学院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看法。古今中外的艺术史早已告诉我们,艺术虽然不同于政治,但从来没有什么是超政治的艺术,艺术设计也是这样。此外,我们所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指政治建设,它包含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五个方面,其中每个方面都与艺术设计有密切关系。为艺术设计的发展开出

了广阔的天地。仅就政治而言,本书还收入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探索》一文。这本来是各类高等院校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本关于《艺术与设计研究》的文集里,有什么必要讲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很有必要。这不仅因为艺术设计与设计者的思想品质、道德修养分不开,而且还因为自古以来世界各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设计,都与设计者对自己所属国家、民族的社会政治的认同、理解、热爱分不开。此外,我们知道西方以包豪斯为重要代表的现代设计的产生一开始就是同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分不开的,包豪斯设计学院的第二任校长汉斯·迈耶甚至在学院中开设了社会主义政治课(详见王受之著《世界现代设计史》第六章)。

本书的另一个可贵的特点,是对艺术设计问题做了开放的、多角度的探讨。其中不仅考察了西方艺术设计教学中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而且还考察了西方现当代设计中的人本主义思潮、新材料及技术与设计、艺术审美观教学的重要性等,提出了不少有深度的看法。有的文章,如对吴昌硕的书法成就及书学思想、元代文人画在当代的意义与价值、藏传佛教中八吉祥符号象征意义等问题的论述看来好像和艺术设计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实际上都是当代中国艺术设计民族化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有一篇专门考察70后青年艺术家审美心

态的文章同样值得我们注意,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发展引起了中国当代审美意识的巨大变化。如何发扬这种变化中居于主流地位的积极向上的东西,疏导抑制其中有负面消极影响的东西,是包含艺术设计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收入本书的文章都正确指出艺术设计是一门“交叉性”或“综合性”的学科,因此深入认识这种“交叉性”的实质特征是关系到艺术设计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艺术设计是19世纪以来大机器工业和商品交换迅猛发展的产物。它使人们日常生活用品的制造告别了中世纪行会的小手工艺,并发展成为现代商业或现代商品生产的一个庞大的部门。因此,现代艺术设计包含了三个方面的交叉:应用现代科技进行制作的技术、产品的实用功能的完满实现和由产品制作使用的材料及产品形式构成所显示出来的美。后一方面又显然是产品的设计制作之所以能被视为一门艺术的原因。但是,一个完全为了实用功能而制作的产品何以也能具有美呢?在这个问题上,由功能主义提出的解释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它主张“形式追随功能”,其次是声称“根据理性结构原理所创造出来的完全实用的设计,才能真正实现美的第一要素,同时也才能取得美的本质”。我们知道,18世纪康德的美学已深刻指出合目的与合规律的高度统一是美的一个根本性的特征。如果合目的与合规律处于分裂、对抗或互不相关的状态,那就不可能有美。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说,一个“根据理性结构原理所创造出来的完全实用的设计”是“实现”了“美的第一要素”和“取得”了“美的本质”的。因为它既是“根据理性结构原理所创造出来的”,又是“完全实用的”,这就是说它既是高度合规律的,又是高度合目的的。合规律与合目的的高度统一是现代一切成功的设计

的根本特征。前现代中世纪行会手工艺设计的美也同样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高度统一的表现,只不过在现代的功能主义看来还不是“根据理性结构原理所创造出来的”,即不是依靠现代科技而创造出的。但不论康德或现代设计中的功能主义都不能科学地说明为什么美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高度统一,只有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才第一次从对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劳动的创造性的科学分析中找到了这种说明。人类满足自身物质生活需要的劳动不是动物那种本能地适应与改变和它的生存有关范围内的自然物的活动,而是自觉地、有意识地依据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去利用和改变整个自然,以实现人的目的的创造性活动。一个被认为是好的或最好的劳动产品就是合规律与合目的达到了最佳统一的产品。而这种统一的达到又正是人的创造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的表现,因此它在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外,还能引起一种由表现在产品形式构成上的人的创造的智慧,才能和力量的感性直观而来的精神愉快,即审美的愉快,也就是康德美学所说的“自由愉快”。正因为这样,马克思在从五个方面论述“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的区别时,其中最后一个区别就是“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①。从人类的物质生产的范围来看,现当代和产品的实用功能不能分离的艺术设计,不正是应用现代科技手段,“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吗?所以,我们前面讲了艺术设计是现代科技、实用功能、产品形式构成的美三者的交叉,不缺少或忽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

马克思的《手稿》写于1844年,正当西方现代设计开始兴起并不断向前发展的时期。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推崇歌德建筑风格的奥古斯都·普金和乔治·斯各特发起了对英国建筑中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的挑战,提出建

筑的好坏首先是决定于它的功能,装饰应与功能相结合,不能脱离功能。到了1851年,英国伦敦世界博览会举行之后,又出现了以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莫里斯(1834—1896)为代表的工艺美术运动。整个西方现代强调功能问题的艺术设计或多或少都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即要求要给广大工人提供有优质实用功能的产品,而不能认为工人只配使用低劣的产品。莫里斯还曾提出产品不但要是有用的,而且还必须是美的。但整个西方的现代设计,从最早的时期开始直到包豪斯的时代都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不能从理论上科学地解决美的本质和规律问题,二是不能理解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而这两个问题恰好是马克思在《手稿》中已经从根本解决了的,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的《手稿》可以说是具有科学形态的艺术设计学的奠基之作,对我们解决当代艺术设计碰到的种种问题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拿莫里斯来说,他看到了现代机器大工业的发展造成了广大工人的贫穷和只能使用低劣的产品,因而主张回到手工艺设计时代,马克思则不同,他一方面深刻的批判了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人的异化,包含莫里斯所说过的劳动不是幸福而成了痛苦。但马克思又充分肯定了现代机器大工业巨大历史作用,认为它的充分发展最终将创造出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从而彻底消除人的异化,包含消除莫里斯所指过的有用与美的对立。因此,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尽管这种“本质力量”还是以“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马克思的这些话与莫里斯主张回到小手工艺的生产去的幻想截然不同,它可以说是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对工业设计发展的热烈召唤!我们今天必须始终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

克思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条件下的发展,它已经和必将继续推动我国艺术设计的大发展。

在一个经济全球化和高科技时代,艺术设计必然是世界性的,但这种世界性又不仅不排斥,而且必然要包容具有不同历史文化传统的各个国家、民族的设计。因此,我们既要充分地面向世界,批判借鉴世界各国设计中一切可取的东西,同时又要增强对我国悠久光辉的文化传统的自觉与自信。在中国古代虽然还没有将艺术与设计相联的说法,但中国画论中所说的“经营位置”、“立意”、“意在笔先”无疑也含有在创作之前先要设计的意思。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以来,中国历代的器物设计、服饰设计堪称丰富多彩,洋洋大观,需要逐步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这是中国设计艺术民族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在设计理论上,中国古代有十分值得注意的遗产。如《庄子》一书讲到“技”与“道”的关系时,认为当“技”达到了最高境界时,“技”就不仅仅再是“技”而超过了“道”,并达到了有如音乐、舞蹈般的艺术美。这种既不否认“技”,但又要超越单纯的“技”而达致艺术美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很有价值。再如同样是《庄子》所讲的“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也很有意义。“鐻”的含义,注家有不同解释。在我看来,可能是用木头制成的,放置或悬挂金属乐器的平台或架子。制成之后,人们惊为鬼神之作,问梓庆是如何制作出来的。他回答说是“齐(斋)以静心”的结果,即根本不考虑是否会因自己的制作而得到赏赐官爵,也不管别人对自己的作品是夸奖还是否定,甚至连自己的肢体也要忘掉。这实际讲的就是要以一种完全超功利的态度全身心投入创作。在今天设计已充分产业化、市场化的条件下,一个设计家接受什么样的设计任务是和报酬的多少分不开的。但我认为一个好的有创意的设计家不应把报

酬多少摆在第一位,而要把所接受的任务是否符合自己的创作个性、风格、审美的趣味与理想放在第一位,以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创作才能与激情,创造出优秀的作品。从这个方面看,上述古代匠师梓庆的故事很有值得当代设计家深思的地方。除《庄子》之外,《周礼·考工记》提出的“材美工巧”的原则及其中关于各种器具的设计的构思,《周易》的“观众制器”的理论也都很值得我们研究。此外,中国历代成功的设计都有一种强烈的人本主义、人文精神,这可以用来矫正西方现代设计常见的技术主义、构成主义的偏颇。这表现在我们已讲过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合规律性往往压倒了合目的性,而且合规律性又是经常是同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所强调的几何学及机械力学分不开的,这就使得设计的形式虽然有简

捷明快的优点,但却又显得冷漠和缺乏人情味。试把西方荷兰风格派及包豪斯设计的椅子和中国明清设计的椅子比较一下,哪一种使人觉得更亲切一些,不仅仅是一个机械性的用具?

最后,希望《艺术与设计研究》一辑一辑出下去,不断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艺术设计作出贡献,充分发挥艺术设计使广大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的作用。

注释:

①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der Mensch formirt daher auch nach den Gesetzen der Schönheit”,其中动词“formirt”是造形或塑形的意,不能译为“构造”。

(本文系作者2012年为武汉纺织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文集《艺术与设计研究》所撰的专稿序言)

(收稿日期:2013年6月13日)